

王通讲学地之沁县说

谷丰 整理



王通讲学地之沁县说

王通,字仲淹,生干隋开皇四年(584年),卒于隋大业十三年(617年),生年34岁,是隋代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,谥号“文中子”。

王通因《隋书》无其传记,以致历史上曾遭怀疑是否有其真人。但在新、旧《唐书》中的王绩、王勃、王质传中均有提及,称其为隋末大儒。

后人研究王通的思想,主要依靠《中说》一书。《中说》所反映的王通思想,有许多可贵之处。王通在政治上,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,倡导实行“仁政”,主张“三教合一”,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,有进步性;在哲学上,致力于探究“天人之际”,围绕“天人”关系这个核心,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、发展观、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,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;在文学上,论文主理,论诗主政教之用,论文辞主约、达、典、则,主张改革文风。这些在今天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

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(603),王通曾经“西游长安,奏太平十二策,尊王道,推霸略,稽今验古”。但没有受到重用,授以蜀郡司户佐、蜀王侍郎。王通忿而东归,以著书讲学为业。

王通对后世的影响之大,近年出现了以王通的籍贯之争,至少不下五处:一是太原说;二是祁县说;三是万荣说;四是襄汾说;五沁县说。而就王通的讲学之地,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论,如今见诸报端网络的也有四处之多:一是万荣说,即史籍载龙门县万荣乡。万荣乡也即今天山西万荣县通化乡,通化乡原属河津县,1954年划归万荣县,位于龙门县南、汾水之南。《隋代征君文中子谥铭》《文中子世家》《中说》中有确切记载。二是河津说,即龙门县之黄颡山、白牛溪。黄颡山、白牛溪位于今河津县东北,故王绩《游北山赋》称之为“北山”(黄颡山名沿用至今)。由《游北山赋》《负苓者传》《中说》所明确记载。三是稷山说。稷山境内的紫金山尚有“文中子祠”。在文中子祠的洞口上方至今存留着明代的石刻文字:“万历三十年闰七月吉日重修”及“稷山紫金山文中子隐居处”。《永乐大典》卷六千八百三十八:“文中子避乱所居之地”在(万荣)“县北五十里”。光绪版《河津县志》:“县东北二十五里,即文中子、东皋子隐居处”,民国版《乡宁县志》:距县城百余里有文中子读书洞。稷山说认为,无论是万荣县北五十里、河津县城东北二十五里,还是乡宁县县城百余里,它们所指的都是稷山县紫金山中的“文中子祠”。四是沁县说。沁县古称铜鞮,在今县城南25公里处的故县村,是唐代铜鞮县城遗址,村东北的紫金山(也称铜鞮山)尚有文中子石室。

文中子讲学地之沁县说,在历史文献、现存实物、名人诗词中都有提及,应该信实:

一、文献考证:省州地方均有记载

《明一统志》卷二一《沁州·祠庙》:“文中子祠,在州城南四十里。文中子,隋王通也。通尝读书于此,后人为立祠祀之。”

清雍正十二年觉罗石麟等撰《山西通志》卷二五《山川九·沁州》:“铜鞮山,在州南四十里,一名紫金山,有文中子书室。”

《山西通志》卷一七四《陵墓三》河津县:“文中子墓,在县南三十里通化村。按曲沃、沁州,胥有文中子墓。”

乾隆《一统志》卷二一〇山西《沁州·人物·流寓》:“隋王

通,龙门人,寓居铜鞮紫金山,有石室。”

清乾隆三十六年姚学瑛等纂《沁州志》卷一《山川》:“铜鞮山,一名紫金山,见《一统志》。在州南四十里故县镇东北。即文中子读书处,上有文中子祠。”又云:“白玉河,在州南四十里。源出蟒龙山,分派合流,东南行二十余里,经铜鞮山下,波流澄澈,水衣蝌蚪不生。相传隋文中子读书山中,时临流盟濯,水为之洁,故名。带绕止山东南里许,至故县镇东,与铜鞮水合。”

乾隆《沁州志》卷二《祠祀》:“文中子祠二,……一在铜鞮县东北紫金山。即文中子读书处。县废入州,祠祀荡然,仅存

石室。”

乾隆《沁州志》卷七《贤贤》:“王通。通尝读书山中。今石室遗址尚存。”

乾隆《沁州志》卷八《古迹》:“文中子石室。石室二,在故县镇东北紫金山之阳,即文中子读书处。”

二、实物印证:沁州建有文中子庙

清乾隆二十九年和珅等撰《清一统志》卷一二〇山西《沁州·祠庙》:“文中子祠有二。一在州之铜鞮山麓,久废。一在州学左,明万历中改建,本朝康熙间屡修,春秋致祭。有唐皮日休断碑,旧在铜鞮山祠,今移学官左。”

皮日休为唐代名士,如今在沁县文物馆尚有皮日休为王通撰写的碑文:

《文中子碑记·唐皮日休》

天何言哉!民不可纵,是生圣贤。圣贤之道德与命符,是为尧舜;性与命符,是为孔颜。嗟!仲尼之化也,不及于一国而被于天下,不治于一时而浸及于万世,非删《诗》《书》,定《礼》《乐》,赞《周易》修《春秋》者乎?故孟子叠踵孔圣而赞其道。复出于千世而可继孟氏者,复何人哉?

文中子,王氏,讳通,字仲淹,生于陈隋之世。以乱世不屑就仕,退于汾晋,序述《六经》,教为《中说》,以行教于门人。仲尼删《诗》《书》,定《礼》《乐》,赞《周易》,修《春秋》,先生则有《礼论》二十五篇,《续诗》三百六十一篇,《元论》二十一篇,《易道》七十篇。孟子之门人有高子公孙丑、万章焉,先生则有薛收、李靖、魏征、李勣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。孟子之门人都郁于乱世,先生之门人赫赫于盛世。较其道与孔、孟实不相负,岂徒然哉!没先生生于孔圣之世,余忍不在游、夏之间,况七十子欤?惜乎!德与命乖,不得睹吾唐受命而歿。苟唐得而用之贞观之治,不后于房、杜、褚、魏矣。后先生二百五十岁,生日休皮氏子,嗜先生道,业先生文,读先生《后序》,高阁于赞述。想先生封壤所在,而为铭云:

大道不明,天地沦精。俟圣幡教,乃出生先生。百氏黜述,六艺腾英。道符真宰,用世阿衡。先生门人,为唐之楨。差肩背孔,接武明卿。未逾己纪,致我太平。先生之功,莫之与京。

雍正《山西通志》卷一百六十六《祠庙三·沁州》:“文中子祠,在紫金山中。相传文中子读书于此。唐皮日休有记。县省祠废。明万历三十年,州守俞汝为重建于学官左。”

明万历年间,沁州知州俞汝为重修文中子庙碑,并有碑文:

《重刻先儒之中子庙碑·明俞汝为》

隋大儒王先生通,字仲淹,沁之铜川人,汉微君霸之后也。世称龙门人。按《汉书》霸居广武,七世而迁。《六子书》仲淹自谓曰:“吾家铜川六世矣。”读书山中,遗址尚在,州人祀之乡贤。

父隆,为隋国子博士。开皇四年,生仲淹。十岁侍父侧,忧皇纲不振,父异之。十八年,父燕居,歌《伐木》而召仲淹,告以在三之义,仲淹于是有志四方。就族父仲华学《易》、《河内关子明学》《礼》、《会稽夏瑱学》《诗》、《东海李育受《书》》、《北平董正《乐》》,不解衣,作书六年,而学已成。西游长安见帝,上《太平十二策》。帝不用,作歌而归。再征之不至,乃续《诗》《书》,正《礼》《乐》,修《元经》,赞《易道》。门人从游者以千计,房玄龄、魏征等皆入室弟子也。

大业中,召署蜀郡司户,再征为著作郎,并不就。仆射杨素重之,劝之仕,不应。常谓李勣等曰:“吾,周之后也,世习礼乐,不遇王者,其天乎!”所著有《礼论》十卷、《续书》二十五卷、《续诗》十卷、《元经》十五卷、《赞易》十卷,并未梓行。及卒,门人谥曰文中子。贞观初,弟子收其议论,分为六部,号曰《王氏六经》。又取问对之书,勒成《中说》。州人于读书处立祠祀之,以房、魏诸君子从祀焉。唐襄阳皮裴美志之详矣。祠在铜川紫金山。

余入境,以先儒道脉幸有存者,欲以身肩之,以请两台,报可。属州武乔可大、参军鲍拱拱纪其事。中祠堂五楹,设龛座。前后轩楹各三。东起茶厅,后寝堂各三。左右库房、东西廂堂各三。祠前号房东西各五。固以重门,翼以便门,缘以崇垣。不三月而規制大备。中设隋大儒、乡贤文中子木主,以魏征、房玄龄、薛收、陈元、李靖、李勣、杜如晦、贾琼、陈叔达、温大雅、姚义等配享,从典故也。祀以春秋上丁,如祀乡贤仪。丹墀既饰,祀事孔明。翼如楚如,可垂永久。士民欢然相庆,谓:“数百年旷典,不图修举自今也。房魏事业,必有振而起者。”乃记其事于石,系之以铭。铭曰:

于维大道,苞胡自天。明时续纪,千古已然。河洛未光,孰启其先?洙泗既往,孰嗣其传?卓哉大儒,奋起铜川。遭隋之乱,韬光自全。讲道河汾,从者如泉。累征不起,潜心简编。亦有《中说》,为世真诠。羽翼斯文,厥功伟焉。庙貌既新,二百余年。谁其新之?台省名贤。咸有德意,祇庸用焉。乃召匠氏,乃埴乃埴。工无须费,士也告虔。有恤其官,有楚其筵。以起后人,振迅而前。百世无疆,侑此芳筵。

三、名人佐证:沁州出土薛收撰《文中子墓志》

《全唐文》卷一三三所录薛收撰《隋代征君文中子谥铭》,是考察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(584-617)生平事迹及其河汾之学与唐初贞观之治之关系的关键性文献。薛收(592-624),是王通高足弟子,唐朝开国元勋,《旧唐书》卷七三、《新唐书》卷九八有传,清王昶《金石萃编》卷五一著录有唐永徽六年于志宁撰薛收碑全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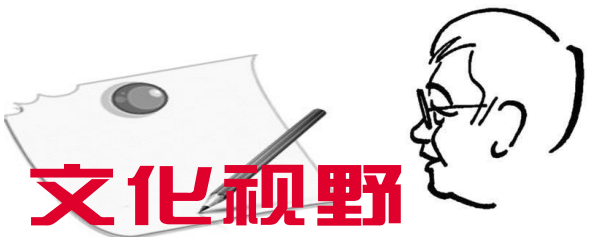
薛收所撰《文中子墓志》碑石,今天已不知所处。但是金代的元好问,却是两次见到此碑的。

元好问(1190-1257)字裕之,号遗山,太原秀容(今山西忻州)人。著有《遗山文集》四十卷、《遗山乐府》五卷、《续夷坚志》四卷。《全金元词》收录其词三百八十余首,最为完备。元好问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史学家、文坛盟主,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,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,被尊为“北方文雄”、“一代文宗”。

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刊本金元好问(1190-1257)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二载《铜鞮次村道中》:

山径一何恶,一洞复一岭。昂头一握天,放脚百丈井。武乡有便道,绕晓铜鞮境。涉险良独难,又复触险景。藤萝碍已穴,怨竹气将瘦。与世恒背驰,用力何自省。河汾绝绍统,疑信纷莫整。铭石出矿中,昧者宜少警。少时曾一读,过眼不再省。南北二十年,梦寐犹耿耿。喻如万别别,灯火得对影。行役岂不劳,聊当忍俄顷。

关于此诗的创作,按缪钺《元遗山年谱汇纂》(元1239)载,可知元好问《铜鞮次村道中》作于蒙古太宗十一年己亥(1239)夏,由济源(今河南济源)北归忻州,途径沁州治所铜鞮县(今山西沁县)。元好问时年五十岁。诗中“南北二十年,梦寐犹耿耿”,则如缪钺先生言,“所谓二十年者,盖回忆丙子南渡时也”。实际是指距今二十三年前,金宣宗贞佑四年丙子(1216)二月,蒙古兵围太原,忻州被兵,五月,元好问奉母避乱,经沁州、虞阪(今山西平陆县东北),南渡黄河,寓居河南福昌县三乡镇(今河南宜阳县三乡镇)。元好问时年二十七岁。诗言铜鞮山水险恶而无尽,抬头去天不盈尺,脚下万丈悬崖。自济源北归忻州路上,有意绕道铜鞮境内,为的就是再看《文中子墓志》。按元好问同时所作《送范德仁董晋宽南归且为谿府诸公一笑》诗,当时是有戈唐佐、董晋宽二人从潞州专程陪同元好问,到沁州铜鞮县境内观看《文中子墓志》刻石的,然后南返潞州。(下转四版)



“人定胜天”解

聿宇寰

“人定胜天”,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,翻阅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工具书,对于“人定胜天”这一词汇给出的解释皆为“人一定能够战胜自然”。其中,“人”指人类,“定”为一定能够,“胜”为战胜,“天”指自然,整个词组断读为“人/定/胜/天”。现在多数人都接受了这种解释。

“人定胜天”的口号,在毛泽东时代,几乎响彻天空。那些年,“人定胜天”这一观念在人们心中已根深蒂固,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,人们以主人翁的姿态,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叫日月换新天”,念念不忘与天斗其乐无穷,与地斗其乐无穷,与人斗其乐无穷。

其实,这种解释与古人的本意相去甚远,或者说根本违背了这句成语本来的意思。关键在于对于“定”字的理解。

“人定”是一个词,在古代指“人心安定”。宋代刘过《龙洲集·襄央歌》中写到:“人定兮胜天,半壁久无胡日月。”其中的“兮”字为语气词,而“人定”是一个词。“定”并非“一定能够”的意思。《易·家人》:“正家而天下定矣。”《书·金縢》:“用能定尔于天下。”“定”均为“安定”之意。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定,安也。”《尔雅·释诂》云:“定,止也。”这些都是指“定”字的本义也。马叙伦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中以为“定”之为“宁”之转注字。“宁”也作“安”意,就是安定、宁静之意。

“胜天”,语出《逸周书·文传》,其云:“兵强胜人,人强胜天。”晋人孔晁注云:“胜天,胜有天命。”“天命”指上天之命,也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。“胜”字,准确的理解应为“胜于”,“胜天”,即“胜于天命”。“兵强胜人,人强胜天”,意思就是“武器强大(先进)了就会胜于人,人力强大了就会胜于天”。

与“人定胜天”结构相仿的词汇还有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里“吾闻之,人众者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”。从语法上说,“人众者胜天”中的“者”字和《龙洲集·襄央歌》中“人定兮胜天”的“兮”字一样,都是语气词;“人众”两字和“人定”两字都不能断读。那么“天定亦能胜人”中的“定”字不能作“一定能够”的意思解释。否则,这个“一定能够”和后面的“亦能”二字重复,有画蛇添足之举。“人众者胜天,天定亦能破人”的原始涵义,就是指某些人可以凭借人多势众,逆天理而行,一时得逞,但一旦老天安定下来,就会击破强暴之人。

从整体来看,“人定胜天”的本意就是“人定兮胜天”,即可理解为“人心安定胜于天命”,也可以理解为“人心安定就会胜于天命”,而不是“人兮定胜天”(人一定能够胜天),不能把“人定”解释为“人一定能够”。

《汉语成语词典》仍然把“人定胜天”曲解为“人一定能够战胜自然”,这是对传统理念的歪曲,应该予以矫正,否则后患无穷。

稀世珍宝——陶帖

—石

沁县文物馆藏《致远堂法书》碑碣(也称拟古杂诗碑),系清乾隆六年(1741)沁州籍进士张孝桢(曾任翰林院编修、五朝国史纂修官、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)巡游江南时于友人处所得,次年求名工刻石成诗碣,并以《致远堂法书》名义广传后世。该碑碣为汉白玉石,共九块,大小一致,每块高35厘米,长110厘米,其中七块刻东晋大诗人陶渊明《拟古杂诗》十二首,二块刻历代名家题跋。

陶潜(365-427),字潜明或元亮,私谥靖节,曾任江州祭酒,镇军参军,彭泽令,后归隐田园,自谓羲皇上人。陶渊明诗作平淡爽朗之胜,语言质朴自然。《拟古杂诗》十二首,从“荣窗下兰”到“我行未云远”皆见《陶渊明集》,落款为“丙辰岁八月下口田舍书与云公潜明潜”。按提款中“丙辰”推断,此作应当写于义熙十二年(416),陶渊明时年53岁。

晋代书法作品极为珍稀,宋代已十分难觅,陶帖(《致远堂法书》)通篇潇洒飘逸,奔放酣畅,其书法造诣极高。从用笔上看,方圆兼备,刚柔相济,开后世赵估《千字文》一路狂草书风先河,用笔钩连和曲直交错,翻折、顿挫、侧笔伸出鬼没,中锋圆笔线条又开后世怀素一路狂草先河。从运笔上看,运笔迅疾,使转纵横,线条的游丝牵带与飞鸟,字与字之间快速流走,狂放跌宕,笔势挟风雷,来去不可遏止。从气韵上看,信笔写来,气畅神融,意多于法。作为一代隐逸文学大师的手迹,此帖在陶渊明研究和中国古代草书钩沉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。

该帖更为珍贵之处,还在于著名历史人物的手迹和铃印得以传世,从南朝到清代观瞻此帖并题跋的有十六人,印章2多枚。除南朝的袁昂、冯道根、徐铉、沈约、陈霸先、韦瓘,唐朝的武则天、狄仁杰、崔玄伟、郭元振、韦嗣立、姚崇,南宋的王十朋,清代的张孝桢等均题跋外,该帖前后还留有“虞老樵、齐乔珍、凤阁审定真迹、



云龛赏玩”等多枚印章,无论是书法还是印章都十分难得,一贴集中了数十位名人大家的文墨资料,堪称历代藏品之最,何况陈霸先、武则天乃帝王之尊,徐铉、狄仁杰、崔玄伟、韦嗣立、姚崇等都是著名政治家,袁昂、沈约、王十朋为当时著名学者。在沁州人张孝桢的努力下,经过1600年的风云际遇,终于走到今天。

从收藏传承来看,陶渊明在落款中称“书与云公”,“云公”是谁?袁昂题跋中有“此杂咏乃书与云龛上人者”,袁昂(401-540),生于齐梁之世,官司空,擅长书画,是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,比陶潜小36岁,对陶应当比较了解,可见“云公”“云龛上人”,贴后有“云龛赏玩”印章。而被称为一代词宗的沈约(441-513)曾亲自从陶白(陶宏景)处所得,在题跋中说的十分清楚:“杂咏诸篇,为贞白陶先生所收,以余爱玩,辄用为赠览矣”。陈霸先起初为梁的大将,又是陈的开国皇帝,在乱世兴替中获得此贴实属正常。到了统一兴盛的唐朝,凤阁舍人韦嗣立将这件藏品献给武则天,武则天的书法造诣颇深,领袖群臣“奉教同观”,被认为是难得的珍品:“朕欣欣循览,如晋代风标,朝野一致,如陶潜者,世徒谓其文咏可念,不知运笔静秀,楚楚娟娟,如深谷芝兰,无人自媚,询可玩重,永炳千秋。”御览后珍重地盖上“凤阁审定真迹”印铃,携入皇家收藏。辗转到了南宋,绍兴年间得中状元之王十朋(1112-1171),南宋著名政治家、诗人、一代名臣)偶然得到这一墨宝,“千秋伟人,字只足重,况累篇长翰,至今完好,非有神物护持未易几此,焚香静对,生爱更敬也。”王十朋自称太原王氏,这件传世千年的瑰宝首次与山西人结缘,若干年后又被另一个山西人张孝桢从民间捞起,“岁辛酉,余于友人处得所草杂诗十二首,古韵流遗,墨迹宛然,遂携至京。每一展玩,辄不忍释手”。张孝桢,字隽升,沁州梅沟人,乾隆元年(1736)进士,曾任翰林院编修、五朝国史纂修官、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,乾隆六年他在巡视江南时见到此贴,为了“以供天下后世知好事者观之”“爱访名工,镌之贞石”,晚年将刻石遗于后人。张氏后人堂崇而鬻之,拓本流传世间,远至海外。

1939年7月日军侵占沁县,期间三次派兵到梅沟张家威逼掠夺,张家后人深埋保护才免遭劫难。新中国成立后,张氏后人张广文、张广居、张怀玉等于60年代将石碑献给沁县人民政府,现藏沁县文物馆。1991年武则天纪念馆拓印此碑,于1993年复制立碑于庙内。《致远堂法书》《陶渊明草书真迹》珍品精影本广行于世,当合张公孝桢“物之美者,不可秘而弗传与传之不广且久”之志。



干馍是沁县地方特产,是代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更是沁县文化的一种标志,研究干馍对于了解和梳理沁县民俗文化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。

干馍是沁县独有的美食。在上党地区,乃至山西省内,干馍只有沁县有,只有沁县人在做,而且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邻近的武乡具有类似的食物,叫做“饼的”,估计有受沁县传播影响的因素,但做法和口味都截然不同。严格地说,武乡的不是干馍,最多为沁州干馍的近代仿制品。在市场认同上,区别也显而易见,这种饼子始终无法和干馍相比,比如干馍卖一块,饼的最大七毛。

干馍独特的地位,注定要担负起民族文化精神传承之重任。所以,干馍的前世今生颇受关注,首先需要解决它从哪里来的疑问?

在我国古代,“饼”是各种面食的总称。至少在汉代,各地就出现了酒肆饼铺,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喜欢的一种饼,传到民间人们叫“太后饼”。后来慢慢有了“蒸饼”“烤饼”“煮饼”等面食。蒸饼开始是死面的,后来人们发明了“发面饼”,形状也不断改进。相传三国时诸葛亮征伐孟获,用面做成人头祭神,“馒头”从此诞生。到了唐代,出现了在火上烧烤的饼,称为“炉饼”,撒了些胡麻(芝麻)叫“胡饼”“麻饼”,面食带汤古代统称“汤饼”,后演化成今天的面条、饺子、汤圆、馄饨、饺子。这些史料说明了我国北方面食文化源远流长,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所有面食都叫做饼,或由饼演化而来。可为什么沁县干馍明明是饼不叫饼,明明不是馍偏叫馍呢?

这就了解一下馍的来历。馍 mó,形声字,字从食从莫,“莫”指“夕阳西下”,转义指“太阳隐没的地方”。“食”与“莫”联合起来表示“太阳隐没地方的食物”。古人认为的太阳下隐没点大致在甘肃一带,所以《尧典》里说帝尧派遣皇家天文官“羲和四子”之一的“和仲”居住在甘肃,负责每天礼送太阳下山。“太阳下山”就是“莫”。“太阳下山的地方”就是甘肃,甘肃一带的食物叫做馍。

原来,我国西部地区将馒头,当然也包括各种饼叫做“馍”,或者“馍馍”,从此可以判定,干馍的老家在西北,我们祖先在迁徙中将这

干馍的西北风

小洲

种带有浓郁西北文化特征的食品带到了沁县,所以干饼不叫干饼,而叫干馍。

我一度认为,完成这一迁徙旅程的,是战争中的军旅或长途贸易的商旅,但至今没有有力的证据。古人云,千年土地易百主,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历史上几多征战,数千年来,商人、周人的部族从这里走过,匈奴人的祖先也曾走过,晋国贵族走过,秦国战马走过,五胡民族先后走过,迁金蒙古和满族人也走过,他们将这的文化带到了全国各地,也将别的地方的文化带到了这里。干馍就经历了这样的命运历程。

我们想象,一个曾经在长安居住的商人,或者曾经从丝绸之路走到长安的人,十分熟悉用关中小麦粉制作的一种美食,并一直从长安带到了上党,然后在沁县居住了下来,让干馍也扎下了根。还可以想见,一支来自西北边塞地区的部队占据了上党沁县,并长期居留于此,将他们的传统习俗带到了沁县,一代代传承下来。现在西北多地还有类似的面食,他们都是干馍的近亲,如今淘宝上甘肃庆阳农家椒叶烙馍、大饼子、小锅盔、白吉饼等卖得很好,椒叶烙馍和咱们的椒盐干馍样子十分接近,有没有亲缘关系?答案应当是肯定的。

从干馍的外形来看,像不像沙漠里行走的人们随身带着的水囊?圆圆的,鼓鼓的。包括它的颜色,焦火烘烤得像西北的黄土,像沙漠瀚海和骆驼的色彩。也许干馍是和羊肉、羊杂汤一起下肚的食品,但很多时候是维系生命的最可靠的保障,在没有牛羊肉的时候,甚至很难找到水的时候。一个民族在风雨中不断成长,坚韧的像干馍。又干又硬,三个月、一年,它不改初衷,保持着生命的本色。我们感谢祖先将它带到这里,带进我的家乡,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能量。

至于干馍的内涵,我在《干馍的意义》中已经表述过了,它是沁县人文精神的一种物化、固化。它博大,谦逊,包容,笃诚,我们吃干馍,就要了解干馍,甚至努力做一个干馍一样的人,朴实无华,不招摇,不造作;千锤百炼,不怕摔打,不怕炙烤;以其本来的小麦粉的芳香,以其辗转数千年的西北风情,坚毅地行走在当下,在这个四处飘荡着洗刷刷的鸟音的当下,从不引人注意,但人们绝不会忘记它。